

## 伍、

# 光復初期大陸人士所見的臺灣

## 一、引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重歸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這個歷史的變局，使斷裂了51年（1895-1945）的臺灣與大陸的關係重新癒合。光復後，大量大陸人士如新聞記者、教育界、農業界人士等來臺參訪。1949年12月27日國共內戰形勢逆轉，成都撤守，國府遷都臺北，海峽兩岸從此二分，百萬大陸同胞隨國府遷移臺島。這批從大陸播遷臺灣或短期來臺參訪的人士，目睹光復初期的臺灣，留下為數可觀的報導、筆記及回憶錄，是價值極高的第一手史料。從這批史料中，我們可以窺見光復初期來臺的大陸人士，所親見親聞的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狀況，可以探討他們的臺灣經驗中潛藏的諸多問題，更可以分析光復初期大陸人士的臺灣經驗，與當時臺灣人以及日本殖民政府官員的證言之間的異同及其潛在問題。

本文以光復初期（1945-1950）大陸來臺人士所撰各種記錄作為第一手史料，探討大陸來臺人士的臺灣經驗及其問題。

本文第二節探討大陸人士所見的光復初期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之突出面向；第三節進一步討論大陸人士的臺灣經驗中所潛藏的各种問題，並取之而與當時日本官方文件的言論加以比較；第四節則分析光復初期臺灣人與大陸人的「光復經驗」之異同，探討「認同」問題的文化基礎及其權力因素；第五節除了提出綜合性的結論之外，並就臺灣人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問題略加討論。

## 二、大陸人所見的光復初期臺灣

1945年8月15日二戰結束，臺灣光復之後，隔絕51年的海峽兩岸人民重新恢復往來，大量的大陸人來臺參訪。他們所見的臺灣，雖然經歷戰火洗劫，斷垣殘壁，但是仍使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集中在以下幾個突出面向：

(1) 臺灣經濟建設遠優於大陸各省：所有光復後來臺的大陸人，對於臺灣的經濟建設都稱讚不已，國府主席蔣中正（介石，1887-1975）在1946年10月7日上午10時在臺北長官公署招待記者談話說：<sup>1</sup>

中正此次來到臺灣，看到臺灣復員工作已經完成百分之八十，衷心甚為欣慰，尤其交通與水電事業，皆可說已

---

<sup>1</sup> 〈蔣中正主席巡視臺灣之感想〉，《臺灣月刊》2期（1946年11月），頁4。

恢復到戰前日本時代的標準。因此，一般經濟事業都能迅速恢復，人民都能安居樂業，以臺灣的交通經濟以及人民生活情形，與內地尤其是東北華北比較，其優裕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

蔣中正對臺灣經濟建設的稱讚，與當時從大陸初抵臺灣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1948.10.01—1979.03.16）中美雙方的委員的觀點互相呼應。光復後來臺的農復會委員蔣夢麟（1886-1964）與貝克（John Backer）對臺灣的現代化公路網、農村之電氣化、義務教育之普及、化學肥料之大量應用以及社會秩序之安定，都撰文大加推崇，預期農復會所推動的工作將較在大陸時期之工作容易成功。<sup>2</sup>1946年9月，當來自大陸的新聞記者訪問當時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有關主持臺灣省政以來之感想時，陳儀說：「臺灣農業，醫藥，氣象事業發達，國民教育普及，水力發電及工業，交通，海港設備均極有規模，實大有助於民生主義之實現」，<sup>3</sup>他對臺灣的經濟基礎推崇備至。經濟學家蔣碩傑初抵臺灣，印象深刻，他說：「看到基隆就覺得中國內地真落後，所以到了臺灣頗有一點新鮮的

---

<sup>2</sup> 蔣夢麟：〈適應中國歷史政治及社會背景之農復會工作〉，收入：《孟鄰文存》（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143-158；John Earl Baker, “JCRR MEMOIRS Part II. Formosa,” *Chinese-Ame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February 1952, Vol.1, No.2（原件係打字油印稿），收入：黃俊傑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91-110。

<sup>3</sup> 任水：〈九月話臺灣〉，《臺灣月刊》創刊號（1946年10月），頁76-77。

感覺。」<sup>4</sup>

除了經濟的基礎建設優良之外，1946年來臺訪問的大陸各地記者也對光復之初臺灣的利息之低留下深刻印象。大陸記者指出，當時臺灣銀行放款利息是3釐6至6釐6，商業銀行的放款利息最高也不過一分，與內地一角二角的利息真有天淵之別。臺灣沒有數日一變的物價，沒有興波作浪的美金黃金投機市場，沒有操縱居奇的奸商，臺灣的物價指數至1946年8月底止是戰前的一百倍，以1945年10月接收時為基數，截至1946年8月底止據長官公署的統計，指數也不過是450，只上漲三倍半。經濟之所以如此安定，主要原因是臺幣政策的成功。大陸記者指出，在內地常批判臺灣維持臺幣一事，但這項政策在臺灣是人人稱頌的長官公署德政之一。假如當初在接收之時，廢止臺幣行使法幣，恐怕到如今臺灣人的財富已盡入於上海投機家的荷包了。內地通貨膨脹，投機操縱之風之所以不能波動臺灣經濟，主要的是有臺幣這一條防波堤。<sup>5</sup>

1947年1月上海《大公報》記者蕭乾（1910-1999）曾來臺灣參訪，環島觀察之後，他說：<sup>6</sup>

---

<sup>4</sup> 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等紀錄：《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59。

<sup>5</sup> 〈京滬平昆記者團臺行觀感〉，收入：《臺灣月刊》2期（1946年11月），頁27-28。

<sup>6</sup> 蕭乾：〈冷眼看臺灣〉，收入氏著：《人生採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原版出版於1948年），頁249-260，引文見頁259-260。

在臺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臺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臺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臺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臺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臺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臺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裡，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臺人卻把壁上的紙條當「布告」。他們要兌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臺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臺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臺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烟，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臺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我後悔庚子年共管中國的計畫沒實現！

在蕭乾筆下，臺灣與大陸是兩個鮮明對比的世界。蕭乾所看到的 1947 年臺灣各項基礎建設，正是光復後臺灣快速邁向現代化的「下層結構」基礎。

(2) 政治自由的壓制與省籍的矛盾：光復初期大陸人士來臺所見印象最深刻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當時臺灣人對政治的

失望以及省籍之間的鴻溝。1946年10月光復之初來臺的大陸記者，就很敏銳地感受到戰後臺灣人民普遍的失望情緒，記者有這樣的第一手報導：<sup>7</sup>

臺灣同胞目前也正正面臨著這戰後的失望，但其程度卻還沒有國內同胞感受的那麼深廣。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半世紀的高壓統治，過著非人的奴傭生活，一旦重新獲得了自由解放，當時的興奮情緒，是難以描述的。每個人都有個美麗的理想，期望過著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生活。但在事實上，戰後的損毀卻未能一時復原，人民生活也未能一時改善，由於許多條件的未能具備，要想建立新的生活，還是需要艱難堅苦的努力，和付出相當的代價的，而並非一蹴即得的，加之轉變過程中的苦悶，以及暫時的經濟不穩定，失業的威脅，這使臺灣同胞也由希望轉成了失望。同時，臺灣現在是歸回祖國了，臺灣同胞原是非常熱愛祖國的，而目前國內時局的動盪不安，也使臺灣同胞感到失望。

由於這種戰後的普遍失望情緒，在國內我常常聽到有人在感嘆著：勝利於我何有？同樣的，有些臺灣同胞也在感嘆著：自由於我何有？

新聞記者姚隼觀察到光復後臺灣人對自由的渴望及其失望，這項觀察也得到另一位新聞記者的呼應，《大公報》記者蕭乾在

---

<sup>7</sup> 姚隼：〈人與人之間及其他〉，《臺灣月刊》2期（1946年11月），頁62。

1947年1月在題爲〈冷眼看臺灣〉的報導中說：<sup>8</sup>

祖國能給臺灣的是什麼？論市政，日人治下的臺灣可為全亞洲做模範。論工業，臺灣遠走在內地的前面。軍事教育他們有過了。忠君訓練他們受過了。五十一年來祇有一樁甜頭他們沒有嚐過，而在臺人心中，認定祇有國民政府可以給予：那就是自由。指摘統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五十一年來，臺人在日本統治下，吃、穿、住、行都遠比中國平民好。工廠講求福利有時強於英、美。俱樂部，彈子間，游泳池，音樂會，凡是一個現代國民的最低享受，那時臺人都享受了。短期間這「新臺灣」也不見能趕上那時的享受。日本人為了擠奶而肥牛，所以什麼都許，可就不許自由（因此臺人多習專門技術，很少習文法科）。然而沒有了自由，即使是超等享受，也還是不舒服。臺人投奔到祖國懷抱來，沒有別的苛求，祇求准他們嘗嘗自由。

從光復後的歷史發展看來，蕭乾所觀察到的臺灣人對自由的追求顯然沒有被滿足。

除了臺灣人對自由的渴望未被滿足之外，光復初期來臺大陸人也觀察到光復後臺灣人在國府統治下之受到歧視。記者姚

---

<sup>8</sup> 蕭乾：《人生採訪》，頁 256-257。

隼觀察到：「有些臺灣同胞認為他們現在正受著一種歧視的待遇。他們抱怨著說：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他們受著壓制，沒法取得較好的職位和待遇；而現在，這些較好的職位又被國內同胞取而代之，而他們卻仍然受著排擠。」<sup>9</sup>大陸記者的觀察與當時臺灣人的切身感受完全吻合。吳三連、陳正添、吳濁流等人，都指陳光復初期國府來臺「接收」大員的腐敗，使「接收」淪為「劫收」，<sup>10</sup>「與日本時代一樣，政府機關的上層部分，由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而臺灣人依然是龍套角色。」<sup>11</sup>臺灣人的感受與大陸記者的觀察互相呼應。在光復後政治上備受歧視的環境之中，臺灣人的「光復經驗」極為辛酸，心情極為複雜，長年追隨林獻堂（1881-1956）的葉榮鐘（1900-1956）有詩云：「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sup>12</sup>二二八事變中遇害的陳焯（1893-1947）在 1946 年 4 月 17 日被行政長官陳儀拘禁時賦詩云：「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sup>13</sup>很能烘托出光復初期臺灣人的真實情感。

在當時國民政府對臺灣人的政治歧視的歷史背景裡，許多

---

<sup>9</sup> 姚隼：前引〈人與人之間及其他〉，頁 63。

<sup>10</sup>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報系，1991），頁 107-108；〈陳正添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頁 85。

<sup>11</sup>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185。

<sup>12</sup> 葉榮鐘所賦「八月十五日」七言律詩的前二句，見《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頁 212。

<sup>13</sup> 轉引自巫永福：〈三月十一日懷念陳焯先生〉，《臺灣文藝》105 期（1987 年 5-6 月），頁 83。



光復初期來臺的大陸人士都深感臺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省籍矛盾。大陸記者來臺灣「在戲院、茶室、街頭，碰著說『中國人』『中國官』『中國兵』的話頭語尾飛進我們的耳朵時，總使我們愕然，以為置身異境」，<sup>14</sup>也有大陸記者報導：「在無意的言談中，臺灣同胞卻慣常說：『你們中國』怎麼怎麼，『我們臺灣』怎麼怎麼，『你們中國人』怎麼怎麼，『我們臺灣人』怎麼怎麼。」<sup>15</sup>總而言之，省籍矛盾是光復初期大陸來臺人士的「臺灣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部份。

光復初期的省籍矛盾，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權力分配的不公，造成臺灣人的憤慨，但是，根據當時來臺大陸人的觀察與實際體驗，語言與生活習慣的差異，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1945年8月，接收臺灣總督府礦工局工業課、職業課、企業整備課及國民動員課的嚴演存（1912-），曾有如下的觀察：

16

外省人多數不會閩南語，與本省人言語不通。生活習慣也和本省人不盡同。例如臺灣人中午吃便當，外省人一般非吃熱飯不可；外省人公務員上下班要坐公共汽車，本省人公務員多半以自行車代步。這些事均屬小事，但日常生活不同，便不易在一夥兒起居，因而不易發生融洽的感情，加深了前述臺灣人民精神上的不滿意。

---

<sup>14</sup> 張望：〈我們都是中國人〉，《新生報》（1946年6月26日），第6版。

<sup>15</sup> 姚隼：前引〈人與人之間及其他〉，頁64-65。

光復初期臺灣人與大陸人在上述政治與社會矛盾的生活之中，在 1946 年糧食配給制度之廢除之後，民間米價波動，省籍矛盾加深，當時臺灣民間流傳一首民謠：<sup>17</sup>

臺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  
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

這首民謠雖或言過其實，但是卻將當時臺灣社會中的省籍矛盾透露無遺。

### 三、大陸人的「光復經驗」與日本官方的 「終戰經驗」：兩種視域的比較

現在，我們可以將光復初期大陸人士對臺灣的觀察，與日本官方的觀察互作比較，以突顯大陸人士的「臺灣經驗」的特點。

#### （一）《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內容

我們探討日本官方的觀點，所運用的史料是尚未公開並譯為中文的《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這份《報告書》由臺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於昭和 21（民國 35，1946）年 4 月，

---

<sup>16</sup> 嚴演存：《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9），頁 38。

<sup>17</sup> 吳濁流：前引《臺灣連翹》，頁 186。

在資源極端匱乏的情況之下以鋼版刻寫油印，日本東京防衛大學附屬圖書館及臺灣大學圖書館均收藏這份油印《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所呈現的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後至 1946 年 4 月之間，國府抵臺辦理接收在臺日本人遣返日本等事務，以及光復初期臺灣島內的民情，史料價值極高。這份史料所呈現是日本殖民當局官方的觀點，可以取之而與光復初期來臺大陸人的觀點互作比較。

《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共包括七段，分別說明戰爭結束前臺灣的情況、戰後臺灣島內的民情、國府接受的概況、本島人的動向、留臺日人的動向、留臺日人的遣返及財產之處理等，最後一段是結論。

## （二）兩種視域的比較

我們將《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與光復初期來臺大陸人士的訪問報告互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臺灣總督府的所謂「終戰經驗」與來臺大陸人的「光復經驗」有異有同，同者是雙方都觀察到光復之初政權更迭之際，臺灣民情不穩；異者是日本官方人士看到了中日民族的矛盾，而來臺大陸人士則看到省籍矛盾。

（1）政權遞遷之際民情的騷動：《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首先報告戰爭結束前，臺灣人在總督府指揮之下，致力於食物

的生產補給、提供各項資材與生活必需品。但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後，情況快速逆轉，《報告書》說：<sup>18</sup>

實際上，日本人統治的各種行政執行力已經開始衰退，所以，日本人仍掌握著各部門的統治權，這反而會給島民帶來壓力，引起不滿。最好趕快廢除各種統治，讓島民心情愉快又輕鬆，避免民心的激憤。首先，要廢除經濟方面的統治。雖然控制食物管理及釐定物價制度是非常困難的事，但是，總比讓島民生活變的痛苦還要好的多。

時至九月，我方與中國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投降調印式」，確定臺灣土地要歸還給中國。這比我們當初所預期得還要早，而島民心裡也產生了一些反抗心，離心的傾向越來越表面化，終致發生衝突。例如：向地方第一線高級官員施暴、拒絕提供穀類等食物、要求歸還以往所提供的食物等，這種紛爭不斷地發生。趁局勢混亂的時候，有些人還搶奪日本人的財物，導致社會治安更形敗壞。而中國先遣來臺的軍官，四處宣傳本島光復解放，使得暴動的情形更加嚴重，即使到了十月份設立指揮所之後，這種熱度絲毫未曾稍減。再加上日本政府的行政執行力也急速的衰退，所以本島的治安更形紛亂。在行政秩序、治安混亂的同時，物價方面也急速的膨

---

<sup>18</sup> 臺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昭和 21〔民國 35，1946〕年四月），手抄本，頁 4。

脹，對島民生活產生重大的傷害。我們對於無法阻止通貨膨脹的發生感到遺憾。

以上這兩段歷史的證言，具體說明了政權轉換之後，臺灣人民「向地方第一線高級官員施暴」、「拒絕提供穀物」、「四處宣傳本島光復解放」等現象。正如日本的臺灣總督府所說，光復後臺灣人心理上「離心的傾向越來越表面化」。

這種心理上的轉向，也獲得來臺參訪大陸人士的印證。光復之後，臺北市慶光復的牌樓的對聯：「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具體而微地烘托光復後臺灣人心理上的轉向。

(2) 民族矛盾與省籍矛盾的不同視野：《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在分析光復後臺灣人與留臺日本人的動向之時，很敏銳地指出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報告書》說：<sup>19</sup>

關於本島人的動向，他們四處宣揚光復。今天，臺灣能夠在文化上、經濟上立足於高水準的國家之林，這都是因為我們日本人努力的結果。可是，一旦中國要統治臺灣，臺灣人的心也迅速的背離日本。留臺日人親眼看到這種情況，他們直到現在才感受到統治異民族的困難所在。除了一部份人之外，大部分的臺灣人都對日本人親切而和善，甚至還抱著同情心對待我們。在我國統治的

---

<sup>19</sup> 臺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昭和 21〔民國 35，1946〕年四月），手抄本，頁 15-17。

過程中，臺灣人學到不少恩惠及道德、仁義之心，他們覺得這些事都應該永銘於心，為日後的日臺關係盡一份力。我們也覺得五十年的臺灣統治對日本帝國的將來有很大的意義。至於原住民，他們以樸實純潔的心態同情日本的戰敗。

《報告書》所感受到的民族矛盾，正是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最根本的問題之一，矢內原忠雄早已指出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漢民族與大和民族的民族矛盾，與資本家（日本人）與勞動者（臺灣人）的矛盾合而為一。<sup>20</sup>這種深層的民族文化與經濟的矛盾，讓光復後臺灣人在心理上快速轉向，使留臺日本人痛感「統治異民族的困難」。這種民族的矛盾更由於國府接收之後大力宣揚臺灣光復而更形嚴重，《報告書》又說：<sup>21</sup>

經過仔細觀察之後，我們發覺蔣主席對日本人採「不以怨酬怨，而樂與為善」的處置方式，而且禁止向日本人報復。這樣的措施很讓我們感激。中國對內（本島人）要求寬容及自制，對外（日本人）期待自肅自戒，並協助中國的行政事務。此外，有些留臺日籍官民向中國解釋五十年來成為日本領土一部分的本島的特殊情況和經歷，期望以之做為日臺雙方良好的友誼基礎。但在實

---

<sup>20</sup>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局，1929）；中譯本：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sup>21</sup> 臺灣總督府殘務整理事務所：《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昭和 21〔民國 35，1946〕年四月），手抄本，頁 17-19。

際上，社會狀況與日華雙方的基本觀念完全相反。因為中國一到臺灣就企圖控制本島民心，為了發揚民族意識，開始譴責日本，不斷地向宣揚光復解放。一下子本島人的心情都完全被控制，他們認為日本人是壞人，導致社會混亂。連中下階層的人都公然地向地方第一線日籍官吏及其他留臺日人施暴，以發洩不滿。有些人則搶奪財物，連純真的青少年也會對日本子弟使用暴力。留臺日人無法抵抗這樣的局勢，再加上物價一直加劇膨脹。不只房屋被收奪，所有留臺日人的資產都要以賠償的名義被接收。這種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讓大部分的留臺日人只好回國，所有的權益、資產都得拋棄，真是令人遺憾。依上述，我們已向中國政府確定如何對待留臺日人，所以只能相信今後的狀況會好轉。

在這一段證言中，日本官員指出：國府接收臺灣之後「發揮民族意識」、「宣揚臺灣光復」，正是臺灣人在光復後敵視日本人的催化劑。

相對而言，光復後來臺的大陸人士印象最深刻的現象，不是中日民族矛盾，而是大陸人與臺灣人之間的省籍矛盾，我們已在本文第二節有所討論，所以不再重覆說明。

#### 四、臺灣人與大陸人的「光復經驗」：「認同」的文化基礎與權力因素

現在，我們進一步將臺灣人與大陸人的「光復經驗」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所謂「認同」是一種複雜的心理現象，其基礎在於文化價值與歷史經驗的分享，但都受到權力分化因素之影響。我們比較兩種「光復經驗」之異同，並討論其涵義。

(1) 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建立在「文化認同」之上：日據時代臺灣人對想像中的「文化中國」不勝其嚮往之情。作家吳濁流說：<sup>22</sup>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

吳濁流上文所說的「眼不能見的祖國愛」，以「臺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偉大的祖國」，<sup>23</sup>都是一種對中原原鄉

---

<sup>22</sup>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40。

<sup>23</sup> 同上書，頁40。



的「文化認同」。正如文化人類學家吉爾滋（Clifford Geertz，1923-）所指出：在許多近代社會中，先天性的感情、風俗等因素，是建構「認同」的重要基礎。<sup>24</sup>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之下對於中原文化原鄉的嚮往，以及他們對中原的一體感與大陸人對臺灣的認同感，基本上都以「文化認同」為基礎。

（2）但是，光復之後國府接收過程的腐敗以及權力的分配不公，卻使臺灣人的認同感降至冰點，吳三連回憶當時的情況說：<sup>25</sup>

臺灣人對中國同胞的熱切感情，迅即被接收人員的腐敗言行破壞殆盡。在華北、在臺灣，情形沒有兩樣。許多接收人員要金子、要銀子、要車子、要房子、要女子，人們稱為「五子登科」。〔…〕

民國三十五年，我曾返回臺灣，停留了兩、三天，所到之處，耳朵聽的都是對接收人員的不滿言詞，不禁感到無比的失望。剛剛才為光復而歡欣鼓舞的同胞，貪污的敗行無異醍醐灌頂。返回天津後，我告訴同鄉，臺灣的情形好比一個石油庫，只要一根火柴，全臺就會引爆。果不其然，過了沒多久，悲慘的二二八事變就發生了。

吳三連的回憶，與所有的同時代的人親証親聞的狀況完全一

---

<sup>24</sup>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p. 260.

<sup>25</sup>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報系，1991），

致。<sup>26</sup>我們將以上所見臺灣人的「光復經驗」，以光復後之初大陸人的臺灣經驗，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到「文化認同」是大陸人與臺灣人心理上的共同基礎，他們都認為臺灣與大陸均同屬中華文化，都分享中國歷史文化傳統。

但是，光復之初來臺的大陸人看到了當時的省籍矛盾在臺灣社會中瀰漫，但是他們較少注意到這種省籍矛盾，實際是建立光復以後本省人與大陸人權力分配的不公不義之上。這種權力分配的不公，正是造成臺灣人對國府的認同感，在光復之後快速消逝的重要原因。

## 五、結論

本文從光復初期大陸人士來臺所見所聞留下的文字，歸納大陸人對於隔絕 51 年之後的臺灣的印象。光復初期來臺大陸人對臺灣的經濟建設已遠優於大陸都大加推崇，但對國府接收臺灣後對政治自由的壓制以及省籍矛盾的加深，也多所指陳。

我們再以同一時間日本殖民政府當局所撰《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與大陸人士的臺灣觀感加以比較，發現日本官員與

---

頁 107-108。

<sup>26</sup> 〈陳正添先生訪問錄〉，《口述歷史（五）——日據時代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85。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 322。葉榮鐘：前引《小屋大車集》，頁 212-213。

大陸訪臺人士都從戰後臺灣觀察到人民心理隨著政權更迭而快速移轉，使日本官員感受到統治異民族之困難，也使他們看到中日民族矛盾之深刻。但是，來臺大陸人士則看到了光復之後由於權力分配問題以及語言與社會習慣的差異，而造成的省籍隔膜與矛盾。我們接著將臺灣人與外省人的「光復經驗」加以比較，就更進一步發現：雙方雖然共享文化傳統與價值，但是光復後初期權力分配的不公，卻造成臺灣人對國府的疏離感。

最後，本文給我們的啓示就是：「文化認同」遠比「政治認同」更爲悠久、深沉而影響深遠。臺灣人在日本帝國統治之下長達 51 年，但是他們以漢文化爲「文化認同」之對象。1947 年 7 月 31 日臺南醫生、文化人吳新榮（1906-1967）日記記載他：<sup>27</sup>

上午製作一份「祖譜」，以傳後代子子孫孫為家寶。內分兩部，第一部記國祖——黃帝以下漢、唐、宋、明、民國各朝代的始祖。第二部記家系，即開基祖以下九代的系圖，其中分三門，〔…〕記後即燒香奉花以報告於祖先的靈前。

正是這種漢民族文化的認同，使吳新榮在光復後那一年將第五個兒子本「華夏一統」之意取名爲「夏統」，<sup>28</sup>也使作家巫

---

<sup>27</sup>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後）》（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 31。

<sup>28</sup> 同上註引書，頁 91。

永福在皇民化運動中拒絕更改姓名。<sup>29</sup>也正是由於這種對漢文化情感，使光復後臺灣人迅速接受國府所鼓吹的民族意識，使日本殖民政府官員深感民族矛盾之不易克服。但是，光復後國府的腐敗與權力的壟斷，使臺灣人的祖國夢爲之破碎。這一段臺灣人的「祖國意識」的轉折變化，具體地告訴我們：「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既不可分割而又互爲緊張的複雜關係。

---

<sup>29</sup> 巫永福：〈三月十一日懷念陳炳先生〉，《臺灣文藝》105期（1987年5-6月），頁83。